

“学历、地域、职业”:80 后新移民的婚配选择

◎陆淑珍

摘要:伴随 80 后新移民而立之年的到来,关注他们的婚姻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通过分析某地通婚圈的状况,了解配偶双方的婚配选择条件,从而进一步明确了通婚圈的界限。本文提出与户籍人口通婚的同类婚姻主要发生在同等学历、相近地域、同种职业范围内。80 后新移民解决了地区的婚姻挤压问题,扩大了地区的通婚圈,但是相对而言,学历较低,职业较差,大龄 80 后新移民与户籍人口的通婚可能性较小。*

关键词:婚姻挤压 80 后新移民 通婚圈 婚配选择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在不断推进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务工青年进城的动机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动因,表现出多样性,如个人的发展等。发展理论及国际经验表明,实现绝大多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终出路,第二代农民工是市民化意愿最强、市民化过程最为迫切,同时也是比较容易融入城市被市民化的群体(刘传江、程建林,2007)^①。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在获得市民身份方面有着强烈的愿望,与户籍人口通婚成为有效途径之一,通婚结果表现出了迁入地通婚圈的改变。伴随着通婚圈的变迁,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日益凸显出来,社会学也逐渐开始对与通婚圈变迁相连的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社会学研究者普遍预存的一个假设是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迁带来了婚姻家庭结构的变迁,作为反映通婚距离的通婚圈也会发生变迁。由此,研究者围绕通婚圈的变迁态势、影响通婚圈变迁的因素以及通婚圈变迁带来的社会后果等展开研究。已有研究中较多的是针对农村通婚圈研究,关于城市通婚圈的研究较少。有学者认为从社会学角度开展对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研究,可以关注农村青年通婚圈的变化及其意义(风笑天,2005)^②。80 后新移民正处于婚恋高峰期,他们进入城市,对户籍人口和他们自身的婚姻圈均造成一定的影响并具有不同的意义。但是现有的关于青年农民工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交往等方面,而对于他们的婚恋问题研究极少(风笑天,2005;许传新,2006;贺飞,2007 等)^③。本文试图引用某地区的婚姻登记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珠江三角洲‘80 后’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研究”(09BSH020);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 2010 年度青年项目“从代际视角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GD10YSH05)。

数据,分析该地区通婚圈的状况如何?对个体和城市社会有什么意义?从而确定与迁入地居民通婚的条件,为促进 80 后新移民的城市融合探寻一条可借鉴的解决途径。

一、概念界定和理论回顾

择偶是两性之间的互相吸引与选择。本文主要分析制度性择偶,它具体是指以建立家庭为目的的择偶。在制度性择偶中,择偶的范围称为通婚圈。传统理论上,通婚圈可以分为两类:等级通婚圈和地理通婚圈。等级通婚圈是指某个社会阶层或民族,把他的择偶范围固定在一定的阶层或民族内。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则被视为越轨。地理通婚圈是指由于空间限制,择偶范围基本上限于附近地区,并且随着地理距离增大,择偶机会减少^④。

本文所关注的通婚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通婚的地域范围和族群范围。所研究的婚姻类型为夫妻双方有一方为 80 后非户籍人口的婚姻。所以引发出两个概念:外地女婿、外地媳妇。所谓的外地女婿是指与户籍女性结婚的非户籍男性;外地媳妇是指与户籍男性结婚的非户籍女性。瑞典遗传学家达尔伯格的隔离理论认为,一个人通常没有机会与特定地理范围以外的人,与特定历史、经济和社会环境以外的人通婚。达尔伯格用通婚带来表示这种隔离。在发展中国家,这种通婚带的地理范围较小。达尔伯格理论内在的含义是历史、经济和社会环境会影响到通婚圈的改变。

二、问题的提出

本文选择珠江三角洲某一个地区作为分析的重点。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该地区常住人口中的未婚人口比例达到 34.4%,未婚人口中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的比例分别为 33.2%和 66.8%。从户籍与非户籍未婚人口的结构来看,性别比稍偏高,分别为 111 和 109;平均年龄相似,约在 21 岁左右,其中男女性未婚人口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22 和 20 岁,户籍未婚人口主要集中在 15-20 岁组,男性的年龄跨度多于女性三岁,而非户籍未婚人口主要集中在 18-23 岁组;户籍未婚人口以失业人员比例最高,达到 56.55%,而非户籍未婚人口以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为主,比例达到 75.6%,其他职业差别不大;受教育程度均是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合计比例达到 80%左右,户籍未婚人口的大学专科以上学历比例高一些。需要指出的是,与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相比,未婚人口比例基本上差别不大,未婚人口中户籍人口的比例略下降一些,未婚人口的性别比大幅下降,但仍处于失调状况,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初婚年龄均约为 24 岁。可见,该地区户籍人口的婚姻挤压已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晚婚晚育特点明显。如果仍依照传统的地区内通婚原则,那么当地人口再生产问题将越见突出。然而从人口结构方面来看,非户籍未婚人口恰恰为人口婚配提供了条件。2004-2008 年婚姻登记数据显示,该地区夫妻双方有一方为非户籍人口的婚姻登记数呈明显增长趋势,占全部登记数的比例也逐渐提高,到 2008 年所占比例为 50.5%。这说明了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通婚现象增多,地区的通婚圈明显扩大。体现了跨区域通婚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通婚圈状况分析

2008 年度该地区婚姻登记数据中,符合研究对象条件的样本量共 2298 对。其中外地女婿为 748 对,占 32.6%,外地媳妇为 1550 对,占 67.4%。该地区的外地媳妇远超过外地女婿。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的基本情况;第二,从配偶双方的角度来看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的婚配选择条件。

(一)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的基本情况

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25.9 岁和 24.5 岁,最小均为 22 岁,最高均为 28 岁,年龄的标准差分别为 1.7 岁和 2.2 岁。具体分布如图 1 所示,外地女婿呈现年龄越大

比例越高的情况,而外地媳妇年龄相对集中在 25-26 岁。可见,相对而言,外地媳妇的年龄差距较大,且集中于某个年龄段。这反映了外来女性人口与户籍人口通婚具有明显的年龄特性,超过 27 岁通婚的可能性则急剧降低。但是外来男性人口年龄越大,通婚可能性越高,尤其是 27 岁年龄段可能性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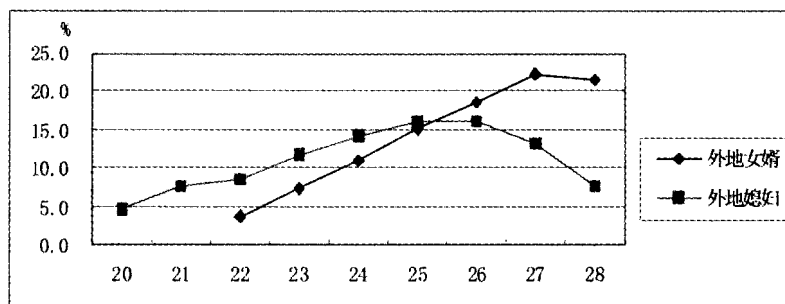


图 1 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的年龄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2008 年部门汇总数据,下同。

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的身份主要为内地居民、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华侨、外籍人员和外籍华人。外地媳妇来源高度集中在内地居民,比例为 98.37%,其他来源的比例极少。外地女婿大多数来源于内地居民,此外澳门居民和外籍华侨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类型。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跨地区的通婚优势。该地区位于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此地,打破了地域的隔离,给婚配对象的选择造成较大影响。另一方面该地是著名的侨乡,因此为涉外婚姻提供了可能性条件。而户籍女性的涉外婚姻可以看成是垂直向上社会流动的一种途径。

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的职业分布情况看,其他从业人员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比例最低,均未达到 1%,除了商业、服务业人员外,外地媳妇的职业比例均低于外地女婿。值得注意的是外地媳妇中无业人员的比例达到 13.1%,说明娶了外地媳妇的户籍男性人口家庭经济相对较为富裕,经济压力较小。

外地女婿的教育程度稍高于外地媳妇,大专以上的比例分别为 47.7%和 35.6%,大部分人集中在初中和高中学历程度。98%左右的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为初婚,外地媳妇再婚和复婚的比例稍高。外地媳妇有离婚史的人数是外地女婿的 3 倍,再婚的机会也稍高一些。可见,外来女性有助于解决户籍离异人口的再婚问题。

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超过一半的户籍所在地为广东省内。户籍来源比例以该地区为核心向附近省份扩散。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通婚的可能性降低。另一方面,数据反映与具有鲜明少数民族习俗的地区通婚可能性较低,如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地的比例极低。总体上,除广东省外,外地女婿的来源地相对分散,而外地媳妇的来源地相对集中于广西、湖南、湖北、四川四个地区。体现了户籍女性人口的通婚圈地域范围相对较大。

(二) 婚配双方对比分析

嫁给外地女婿的户籍女性人口平均年龄是 25.7 岁,标准差为 3.1 岁,最低年龄是 20 岁,最高年龄是 39 岁,主要集中在 24-27 岁(55.2%)。超过一半的为其他从业人员,接近一半的为大专学历人员,绝大部分为初婚。配偶双方年龄平均相差 0.25 岁,中位数为 1 岁,男比女

年小的比例为 31%,差距在 0-2 岁之间的比例为 50.6%。同类职业内通婚的比例为 61.3%。男女双方教育程度一致的比例为 45.0%,丈夫的教育程度低于妻子的比例为 33.5%,丈夫的教育程度高于妻子的比例为 21.5%。配偶双方均处于初婚的比例为 94.0%,妻子再婚的比例约是丈夫再婚比例的四倍。

娶了外地媳妇的户籍男性人口平均年龄是 28.6 岁,标准差为 4.5 岁,最低年龄是 22 岁,最高年龄是 54 岁,主要集中在 25-29 岁(55.9%)。超过一半的为其他从业人员和大专学历人员,绝大部分为初婚,再婚和复婚比例合计约为 10%。配偶双方年龄的平均相差 4.1 岁,中位数为 3 岁,男比女年小的比例为 10.3%,差距在 0-4 岁之间的比例为 54.1%。同类职业内通婚的比例为 59.8%。男女双方教育程度一致的比例为 38.4%,丈夫的教育程度低于妻子的比例为 14.1%,丈夫的教育程度高于妻子的比例为 47.5%。配偶双方均处于初婚的比例为 89.8%,丈夫再婚的比例约是妻子再婚比例的八倍。

通过分析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配偶双方的情况,可以看出他们婚配选择的条件。他们各项的差距越小越反映选择条件的一致性,反之,差距越大说明不构成婚配选择的条件。如表 1 所示,外地媳妇的配偶双方的年龄平均相差岁数远超过外地女婿,而在同类职业内通婚,双方教育程度一致的比例均较为接近。此外,对配偶双方的变量进行相关分析($P=0.000$)表明,配偶双方的年龄、职业、学历、婚姻类别、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均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但相关程度较高的是教育($\text{Gamma}=0.646$)、户籍所在地($\text{Lambda}=0.506$)、职业($\text{Lambda}=0.176$)。在配偶双方学历匹配方面,基本上同等学历相匹配,或稍高于或稍低于一个级别的学历匹配。女性从中专及以上,男性从大专及以上表现了这一明显的特点。相对而言,大专和本科学历的男性择偶的学历范围包含各层次,而初中和高中学历女性择偶范围最大。可见,低学历女性和高学历男性的择偶范围较大。配偶双方职业匹配方面: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职业的人倾向于配偶为其他职业,尤其是男性的倾向更明显。专业技术人员倾向于同类职业的配偶,女性的倾向稍高些,此外男性与其他从业人员婚配的机率较高。男性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首先倾向与其他从业人员婚配,其次才是同类职业,而女性恰好相反。商业、服务业人员同类职业通婚可能性较高,其次是与其他从业人员。其他职业基本上同类职业内通婚。对于男性而言,其他从业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跨职业类别的通婚机会较高。对于女性而言商业、服务业人员、其他从业人员和无业人员的跨职业类别的通婚机会较高。跨职业类别通婚机会高说明了通婚圈的类别范围扩大。由此可见,女性的通婚圈更大些。以上分析可以大体归纳为“年龄不是差距,职业要考虑,地域仍是距离,学历是关键”,说明了他们婚配选择的重要条件是学历和地域。

表 1 婚配双方的比较分析

婚配双方比较项目	外地女婿	外地媳妇
配偶双方年龄的平均相差	0.25 岁	4.1 岁
男比女年小	31.0%	10.3%
同类职业内通婚	61.30%	59.8%
男女双方教育程度一致	45.0%	38.4%
丈夫的教育程度低于妻子	33.50%	14.1%
配偶双方均处于初婚	94.0%	89.8%
配偶的再婚比例	5.0%	9.4%

随着各种交通条件的改善,外来务工大浪潮的出现说明了地域不再是问题,但由于地域体现了文化的差异性,因此它仍是距离。通婚的条件从传统的地域内通婚扩大为职业内、学历内通婚。现代人的婚配选择附于传统的“门当户对”全新的阐释,即地域、职业、学历相当则门当户对。古德认为,人类在择偶规则方面具有一般模式——“同类联姻”,即人们在婚姻市场的选择,总是趋向于选择与自己多方面,如居住、职业、地位、教育、种族以及爱好等方面相同或相近的人作为配偶(古德,1986)^⑤。张翼用“阶层内婚制”概念解释了同类联姻现象,认为基于职业、教育和收入的差别而新生的阶层等级以及阶层多元化,使得阶层内婚制越来越显著(张翼,2003)^⑥。

在这种大体上的同类婚中,社会学家发现,许多男人倾向于娶在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略低于自己的女人,这样,丈夫拥有相对较高的地位。或者说,当男性在自身阶层以外择偶时,常常是“下向婚”;而女性在自身阶层以外择偶时,常常是“上向婚”的^⑦。然而在本研究中针对80后新移民的婚配分析发现的结论与此相反,80后男性新移民更多的是“上向婚”,即倾向于娶各方面略高于自己的户籍女人,女性新移民则更多的是“下向婚”,即倾向于嫁各方面略低于自己的户籍男人。

四、结论与讨论

第一,某种意义上外地女婿和外地媳妇解决了迁入地区的婚姻挤压问题,减少了因婚姻挤压而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提高了离婚的户籍人口再婚的可能性。李南撰文指出,对高出生性别比后果的第一个定量估计是从2010年开始,将出现初婚市场失衡每年有近百万“额外”未婚男性没有初婚对象,此数约为男性年初婚人数的9%。即使发生初婚模式的显著变化,这种“额外”未婚男性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比例上也是难以为变化了的初婚模式所容纳的^⑧。研究中发现嫁给外地女婿的户籍女性人口大多是高学历人才,或者年龄偏大的户籍女性人口嫁给年轻的外地男。可见,80后男性移民解决当地“剩女”的婚配问题。80后新移民与户籍人口通婚对双方的婚配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户籍人口而言,通婚最重要的是解决个人婚恋问题,通婚圈的扩大有利于个人婚配选择条件的实现。对于80后新移民而言,通婚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解决了个人的婚恋问题,并获得了市民身份,打破传统的地域内通婚原则,为个人的社会流动创造了条件。通婚圈的扩大验证了达尔伯格的隔离理论。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地区的通婚圈。该地区的通婚圈地域范围已经扩大到全国其他省份,甚至是港澳台、国外等区域,通婚的族群扩大到职业和学历领域。通婚圈以地区、职业、学历为界限,形成了职业、区域、学历的隔离,在这些范围内,存在80后新移民与户籍人口通婚的可能性。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如果以个人的先赋和自致条件来划定,通过前面的分析得出该地区通婚圈的界限更多的是以自致条件为主,是可以通过人的再社会化过程来实现的。从而也给80后新移民与户籍人口通婚提供了一个思路,即他们的城市生活中,个人学历和职业方面的提升将为个人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尤其对男性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此外,以学历职业和的分层带来了阶层内通婚。通过婚介机构和组织的桥梁对促成通婚起到一定的作用,因此有效果的婚介机构和组织应该在考虑到通婚条件的基础上,开展同职业或同学历范围的婚介活动,才能发挥良好的婚介效果。

第二,通婚是80后新移民融入当地的方式之一,而通过婚姻关系融入当地的状况如何,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一方面是婚姻稳定性问题。本次研究发现外地媳妇的复婚比例较高,反映了结婚冲动性和婚姻磨合性之间的关系。婚姻关系的稳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和谐

发展。另一方面社区融入情况。最近谭琳等人对江苏省张家港地区的“外来媳妇”的生活经历与“本地媳妇”进行了对比分析,揭示了“外来媳妇”的婚姻特征、生活遭遇和感受以及融合的策略,研究者认为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很多外来媳妇对她们在张家港的婚姻以及和睦的家庭生活还是感到比较满意,她们自身为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外来媳妇在大城市和经济特区会越来越多,研究者建议外来媳妇主动寻找策略,积极融入到家庭和社区中去。谭琳等人把婚姻与社会融合联系在一起的视角为进一步研究 80 后新移民的婚恋问题提供了条件。

第三,80 后人口都面临三十而立的问题。2010 年,“80 后”将首次出现 30 岁群体。由《法制晚报》联合智联招聘发起了一项调查,本次调查涵盖薪酬水平、生活现状及工作稳定度三方面,有近万人参与。调查显示,近六成 30 岁“80 后”薪酬不高,恐惧家庭责任,生存状态并不理想。近六成的职场人表示不能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五成以上的职场人在工作上力不从心,近五成无房无车,且处于未婚状态,该类人群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结合本文的分析了解到,虽然当地的通婚圈发生了改变,但是仍有一部分人的婚配问题较为严重。随着三十而立的到来,学历较低,职业较差,大龄 80 后新移民与户籍人口的通婚可能性较小,他们将面临各种婚姻压力,由此相关联的是父母的赡养问题。我国传统的说法“成家立业”,而他们家未成,业未立,生活面临各种困境,这些都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关于婚恋问题,由于年龄增长,与户籍人口的通婚可能性降低,形成了严重的高龄婚姻挤压问题,因此,他们只能与同属外地户籍的人结婚或回乡结婚。另有调查显示,80 后新移民的回乡结婚意愿较低。由此可以预见,一部分 80 后新移民将成为城市中漂泊不定,无家的人。这也意味着将会滋生某些地下婚姻交易市场,产生出与婚恋有关的各种犯罪活动,进而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稳定。

注:

- ①刘传江,程建林.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市民化[J].经济纵横,2007(4):18.
- ②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J].人口研究,2006(1):57.
- ③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J].南方人口,2007(4):52.
- ④李若建.人口社会学基础[M].广州:中山大学,1992:68.
- ⑤W·古德.家庭[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 ⑥周贤润.通婚圈研究综述——以社会学、人类学学科为视野的讨论[J].法制与社会,2009(9):248.
- ⑦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通婚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青年研究,2006(9):41.
- ⑧李南.高出生性别比及其婚姻后果[J].中国人口科学,1995(1):16.
- ⑨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
- ⑩赵丽丽.我国女性婚姻移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85.

作者单位 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 颜 波